

THREE DIMENSIONS OF SPATIAL WRITING IN CENTRAL ASIAN DONGGAN LITERATUR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LITERARY GEOGRAPHY AND THEIR CULTURAL ORIGINS

文学地理学视域下中亚东干文学空间书写的三个维度及其文化渊源



<https://doi.org/10.24412/2181-1784-2025-26-339-348>

梁增凯，博士研究生

兰州大学文学院

Liang Zengkai, Doctoral students

School of Literature, Lanzhou University

Liangzk2023@lzu.edu.cn

Annotation: Central Asian Donggan literature is an important branch of ethnic Chinese minority literature. Its literary works exhibit a multitude of spatial representations, which, according to the methods of literary geography, can be categorized into three spatial dimensions: field geospace, landscape geospace, and abstract space. These three forms of space represent a progressively more abstract construction process, moving from geo-centration to subject-centration to metaphysical space. Furthermore, the literary spatial writing of these three forms is collectively influenced by Chinese culture, mainstream Central Asian culture, and Muslim culture.

Keywords: Central Asian Donggan literature; space; culture; literary geography

Funding Statement: This article is a result of the Fundamental Research Funds for the Central Universities of Lanzhou University, titled "Research on the Creative Transformation of Three Major Ethnic Epics in Contemporary Literature" (Project No.: 2024lzujbkyxs013).

摘要: 中亚东干文学是华裔少数民族文学的重要分支，其文学作品呈现出大量的空间样貌，按照文学地理学的方法可以将其分为场域地理空间、景观地理空间和抽象空间三个空间维度，三种形态的空间是一个地理中心化-主体中心化-形而上空间的越来越虚化的建构过程。此外，三种形态的文学地理空间书写，受到了中华文化、中亚主流文化和穆斯林文化三种文化的共同影响。

关键词: 中亚东干文学；空间；文化；文学地理学

基金项目: 本文是兰州大学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项目“三大民族史诗

在当代文学中的创造性转化研究”（2024lzujbkyxs013）阶段性成果

引言

中亚东干族是我国西北回族移民的后裔，目前人口已达十万多人，主要分布于乌兹别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和哈萨克斯坦三国，距今已有 140 多年的历史。中亚东干族的语言发源于我国西北方言，又独具特点。丁宏认为，东干语属于中国西北方言的地域变体，东干文的产生开创了以拼音字母拼写汉语并被实际使用的先河。[依玛佐夫 2001:2-10]中亚东干文学分为口头文学和书面文学两种形式，在创作实践中涌现了大批的优秀作家，比如亚瑟儿·十娃子、阿布都、优素卜·杨善新等人，亚瑟儿·十娃子被中亚回民誉为东干文学奠基人。中亚东干文学作品以反映生活和表达感情为主，文学作品中呈现出大量的空间样貌。柯罗在《文学地理学》中阐发了文学地理学研究的三条路径：地理学的、地理批评的、地理诗学的。[柯罗 2021:1]本文以此三种方法为依据，把中亚东干文学的地理空间分为场域地理空间-景观地理空间-抽象空间三个维度，以期管窥中亚东干文学的空间书写及其多层次空间书写的文化渊源。

一、场域地理空间：承载历史记忆的“地理中心化”书写

地理空间是承载故事发生和作家抒发情感的场域。随着上世纪 80 年代以来的“空间转向”，地理学的方法在文学研究中引起关注。柯罗认为：“文学研究越来越多地呼唤使用地理学的方法和工具来分析文学在空间中存在以及空间在文本中的呈现”，[柯罗 2021:69]并提出地理学研究方法在文学领域的两个要求：“重新定义所展现的地理区域；修复它的参照范围。”[依玛佐夫 2004:69]文学中的地理空间在参照坐标的定位中建构起来，地理空间中的参照物也承载了空间的历史记忆。段义孚认为：“建筑空间似乎会折射出人类情感的韵律，所以它被称为‘凝固的音乐’——空间化的时间。”[段义孚 2017:97]文学作品中以参照物为定点的地理绘图和历史痕迹都围绕“地理”展开，共同呈现了文学中的地理空间样貌。

中亚东干文学中场域地理空间书写有两种形式：自然场景空间的建构和人文地理空间的建构。先看自然场景空间。中亚东干文学中常描写东干人劳作、生活的环境，并与天气、时令结合紧密。诗歌《夏天》描绘了夏天大雨中的田野场景，“黑云猛猛的起来哩/蓝天黑罩/热头的光亮也没哩/不像赶早/白雨（大雨）当卧儿（当时）倒脱哩/雨水起泡儿/树枝草苗笑脱哩/雨地呢洗澡

儿/渠呢洪水淌脱哩/电闪，雷响.....”，[依玛佐夫 2004:5]大雨倾盆，水渠里雨水哗哗地流，田地里的禾苗欢快地洗澡，小动物在摇晃的树下躲雨，天一晴就又跑了出来。诗歌描写了天上的“热头”和“黑云”，田野里的树和“蚂蚱儿”“黑雀儿”，地上的水渠和“草苗”，通过景物的描绘构建了一个东干人劳作的雨中田野空间。自然场景在中亚东干文学中出现最多，诗歌《天上的星》《白云》等都描绘了天空和田地的自然场景，小说《拉比尔失笑哩》《在稻地上》等则描绘了河边和田地的自然场景。

再看人文地理空间建构。人文地理空间构建不仅描绘地理空间场景，也会通过建筑等标志物来展现地理空间中的历史沉淀。小说《阿夫罗拉》讲述了西拉儿和同学游览列宁格勒的事，看到高楼和桥梁仿佛十月革命场景就在眼前。“列宁格勒真是清秀：连一根线儿一样的一道，一道的端巷子，一处不像一处的高楼房，没夜亮的大河，杂样儿的花桥。再下来，每一个桥，每一处地方都有自己的历史呢。知道的人们表说开哩，太招听的很。”[依玛佐夫 2004:56-57]通过冬宫、桥梁、高楼的游览，整个列宁格勒的地理空间样貌呈现了出来，同行者们对十月革命都非常熟悉，于是“表说开哩”，列宁格勒通过地理标志物获得了空间样貌和历史记忆的双重加建构。小说《从要来》描绘了工人和孩子在莫斯科旁边捷列诺格拉达城的广场玩耍的场景，“把干掉的松树匠人们都旋成野牲的样子娃们在高头骑的要的呢。”[依玛佐夫 2004:74]小说里广场的位置通过莫斯科和捷列诺格拉达城的定位展现了出来，又呈现出工人劳作和儿童玩耍的生活场景，把地理空间面貌和东干人的劳动生活结合在了一起。

场域地理空间是以还原地理场景为中心的空间建构，是文学地理空间书写中最基础的空间形式。地理空间中的自然景物和建筑参照物为地理空间绘图定位，又承载了时间流变中的历史记忆。此外，中亚东干文学中自然场景和人文地理空间的建构都与东干族文化和生活紧密相连，此时的地理空间承载了中亚东干人的感性经验，于是文学地理空间建构则由地理中心化向主体中心化转移。

二、景观地理空间：融合感性经验的“主体中心化”书写

文学作品中的文学地理空间建构本身是对真实地理空间的重构，以地理学方法对文本的阐发完成了地理批评的基础。柯罗同意理查德的“景观”说：“（景观）不是这样或那样的参照物，而是一组‘所指’的总和，是一种文学的建构。”[柯罗 2021:112]这体现了文学地理空间的双层结构，一是真实地理空间的能指形式，一是人类的空间想象。柯罗认为：“每一个想象的空间基本上

都是主观性的——‘虚构的地理学必然是内部空间的表达：主体是在空间中进行构思的。’”[柯罗 2021:106]主体将自己想象中的宇宙投射到虚构的地理空间中去，为虚构空间赋义。从这种地理批评视角看到的文学地理空间是“更加‘自我中心化’，而非‘地理中心化’。”[柯罗 2021:116]也就是说，真实性和主体空间想象赋予了文学地理空间双重内涵，在景观地理空间中，地理空间更多地承载着创作主体所赋予的功能的、审美的、情感的意义内涵。

本节从两个方面来阐发中亚东干文学中的景观地理空间书写：功能性景观地理空间和情感的景观地理空间。景观地理空间的构建与中亚东干人的文化和审美紧密结合，文学作品中的景观地理空间往往能够反映东干民族的整体价值取向和文化背景，作家主体也通过基于地理空间的空间联想来抒发自己的内心情感。首先，中亚东干文学中最典型的功能性景观空间是经堂。“经堂教育”在中亚东干族从我国西北地区迁移之前就已经存在，在东干人定居中亚后得到延续。著名的东干族作家亚瑟儿·十娃子十岁时就进入经堂学习，十娃子的同学叶塞儿等人后来都成为东干人中有名的阿訇，可见经堂教育在东干族是非常普遍的。经堂教育“是以培养宗教人才和普及宗教知识为目的的宗教教育”，[依玛佐夫 2001:24]不仅如此，经堂以其宗教信仰的神圣内涵，还担负着道德教育的责任。小说《三个军人》就是在经堂中展开的，叙述者开篇就说：“教书，调养娃们——这是我的营干。”[依玛佐夫 2004:162]叙述者请来了一家三代参加过十月革命的军人，来讲述他们在战场上的英勇事迹。而后众人来到苏维埃军人纪念碑前：“娃们巴格老者拿来哩一筐子新鲜花儿端给哩.....周围都悄悄儿的：纪念折掉的军人们的呢。”[依玛佐夫 2004:165]可见，经堂承载了中亚东干人宗教信仰和道德教育的双重内涵，是中亚东干人的文化寄托之所。

中亚东干文学的中景观地理空间书写，更多的是借地理空间联想来抒发作家的内心情感。首先是感叹时空流变。诗歌《天上的星》通过对天空景观的观察和对比，抒发自己对童年怀念和无奈时光流逝的感情。“一打那会儿，我记的/亮明星连月儿/眼睛儿挤上肯（经常）惹我/一直儿到今儿.....这就可价几十年哩/亮明星连月儿/还拉香甜磨的呢（拉磨：聊天）/还在一坨儿。”[依玛佐夫 2004:3]天空中星星闪烁，几十年不变，从前自己寻找跌落的流星，如今却找不见了，几十年一晃而过。其次，也有通过景观对比感叹今日生活好过从前的，如诗歌《伏龙芝城》：“年代过哩，我大哩/你也变了卦哩/我的儿子找不着/一把沙子，叫我/花园、小街他知道/可是踪影他不找”，[依玛佐夫 2001:30-31]时代变了，花园和街道显示了家乡生活好的变化；再次，也有通

过景观来寄托青年男女爱情的，比如诗歌《淡青二门儿》：“.....天天-寤寐我拜望/你的住房/过来，过去走开哩/把它爱望/就像从前，还在呢/高稍门楼儿/就像从前，关的呢/淡青二门儿。”[依玛佐夫 2004:45]淡青色的二门口隔开了里面和外面两个空间，相爱的青年男女无法见面。

中亚东干文学在景观地理空间抒情中最多的是抒发思乡之情。杨建军认为：“就作家思乡心态而言，世华文学伊斯兰文化带的文学作品，有一种独特的‘三重’望乡心态.....伊斯兰宗教圣地麦加，诗人祖先所居的中国，诗人所居的中亚地区，乃诗人心系的三个‘故乡’。”[杨建军 2009:62]诗歌《一把亲土》抒发了诗人思念中亚家乡之情，又表达了诗人的老辈儿思念中国宁夏老家的深厚感情：“楚河（中亚河流名称）沿上生-养下，在这儿长大/在山场呢我住哩.....在伊犁，宁夏我去哩/我爷的省/又宽，又大，又洒落/银川京城（省会）/兰州的省呢也浪哩/黄河沿上/公园，地方太清秀/啥都看上/可是把家总想哩/想哩楚河.....打这儿走呢想起来/老子的话/‘把宁夏的黄亲土/拿来一把/给你爷的坟头上/他的面上/要紧苦上’。”[依玛佐夫 2004:23-24]诗歌中出现了“楚河沿”“伊犁”“兰州”“宁夏”等多处地理名称，这些地理名称对诗人而言是其游览经验的概括，是一种高度集中的景观地理空间形态，诗人离开中亚就会想念中亚家乡，而远在中亚的父亲则托儿子带一把宁夏的黄土回去，寄托了老辈儿人对中国故土的思念和眷恋。诗歌《北河岸上》则抒发了诗人对心灵家乡圣地麦加的“望乡”心态：“我爷，太爷都住哩/北河岸上/我也在这儿住着呢/孝顺老娘/就是，北河我的家/我的母亲/它比克尔白都贵重/比黄河亲.....我爷、太爷还说过/——麦加地方，也是老家，太贵重，连命一样/圣人生在那塔儿哩/他的心灵/把《古兰经》下降哩/穆民的根。”[依玛佐夫 2001:164-165]诗人在这里表达了对中亚家乡的眷恋，而诗人爷爷、太爷则诉说了对穆斯林宗教圣地麦加的心灵追寻。《北河岸上》的景观地理空间书写面向的空间范围更大，空间构建融合了创作主体的感性经验，历经几辈的人的感情抒发更具历史的厚重感。除此之外，诗歌《书信》《我爷的城》等都依托场景地理空间的构建，从不同角度抒发了诗人“三重望乡”心态。

景观地理空间更加强调空间建构的“主体中心化”，文学地理空间在地理空间图绘的基础上，更多地融合了创作者的感性经验的表达，景观地理空间经由作家的再创造，被赋予功能的、审美的、情感的内涵，体现出了文学地理空间的多层结构。此外，文学地理空间除了承载事件发生和寄托主体的赋义外，空间本身也具有一定的抽象内涵，可以脱离地理学意义的物质性而具备形而上色彩。

三、抽象空间：象征结构和权力关系书写

文学地理空间研究从地理批评到地理诗学的过渡，剥去了地理空间的物质外衣，只留下地理空间的结构形式及其与世界的象征关系。柯罗否定地理诗学方法的“语言学转向”，认为这“将文学的理论与实践引入了一条歧途——过分地宣扬文本至上观念。”[柯罗 2021:120]地理诗学的方法应指向抽象空间的建构：一方面，按着洛特曼的路径将“‘艺术文本的结构’与其呈现的空间结构关联起来……它的语义场被一条‘边界’穿过，它‘将文本的空间划为两块亚空间’，不同的空间包含有充满生机的关联。”[柯罗 2021:141-142]另一方面，按着米歇尔·德吉的路径认为地理诗学“还包括培植一种人类与世界的象征性关系。”[柯罗 2021:128]也就是说，抽象的地理空间内部是非均质的，空间被界限割裂并相互关联；另一方面，抽象的空间的建构还体现着一种人类与世界的象征关系。

首先，抽象空间内部体现着一种权力关系。列斐伏尔认为空间是生产的结果且相互关联：“空间作为一种产品，并不是指某种特定的‘产品’——一种事物或物体——而是指一组关系。”[列斐伏尔 2021:22]福柯进而考察了人与空间的关系：“建筑的工具复制了（其中将有或多或少的权重）社会的等级”。[福柯 2021:9]建筑作为具体的空间形态承载了社会的等级关系，而空间中的权力等级关系需要依靠人的活动来实现。中亚东干文学中常有“炕”这个空间意象，炕作为一个独特的家庭居住空间，它的位置和使用体现了中亚东干族人的权力关系。在小说《老马富》中，老马富因受乡民爱戴而被大伙请到炕上去坐，相比之下，尽管青石儿已然胡子花白，但是因其不受尊重而只得坐到“炕沿子”上。炕作为家庭起居的重要空间，炕的位置体现出就坐人的尊贵程度和社会等级关系，因此老马富能“上炕”体现的是其在乡亲中尊贵的社会等级地位，而青石儿尽管年事已高，因不受尊重而社会等级地位低，只能在炕的边沿上在落座。在小说《乡庄》中，老者向全家人宣布重要决定时就坐在炕中央，可见炕的位置能够体现出人物和事件的重要程度，炕作为一个具体空间承担着社会等级关系，体现着人物主体间的权力关系。

其次，抽象空间体现着人与世界的象征关系。柯罗从两个方面对这种象征关系进行阐发：一是自然与人的思想二者逻各斯紧密联系；二是自然摆脱外部特征在人心灵中产生共鸣。先看前者。柯罗认为：“人类的生存环境从来都不是简单的物理感受；从来都是充满了被言说的意义，且因言说而更加适宜栖居……生态学是一门学说，更是一种家园思想，即对人类在尘世如何栖息的思考。”[柯罗 2021:128]也就是说，地理空间环境和人类思想在象征意义上

共同占有一个中心。诗歌《后晌》描绘了河岸草上青年男女互相爱慕和骚动的感情，诗歌中融入大量景物进行环境描写以及青年男女的心理活动，并以环境和男女的心境作对比：“水皮儿上漂子太显眼/渔朗孽障（可怜）……鱼没钓上-小事情/一场的空/保不住的事情-/姑娘的心。”[依玛佐夫 2004:15-16]此时的景与事都与男子心境一致，鱼漂显眼如同男子爱慕女子的心情藏不住，鱼没有钓上是一场空，就害怕抓不住女子的心也是一场空。诗歌往往先言他物，却和诗歌叙事共同分享一个意义内核。诗歌最后以写景结尾，更具象征意味：“苇子喇-啦儿响的呢/周围消停/河呢洪水淌的呢/黑水没尽。”[依玛佐夫 2004:16]此刻男女没有动静，只有风吹苇子和河水流淌的响声，渲染了男女接触的害羞之情，又借用“水”的意象，象征男女之间的爱情。

再看后者。诗人在创作中会将世界的广延转化为内心的缩影。柯罗认为：“根据巴亚尔的观点，一个文学空间所产生的真实效果并不在与它和外部地理现实的彼此对应，而在于其表达‘内心家园’的能力……文学地理学是作家无意识的‘空间部分的投影’。”[柯罗 2021:108-109]柯罗称这种地理空间为“抽象的景观”，读者无法找寻作家地理空间建构的精确位置，这是作家游览经历形成的唯一景观，是其内在的共鸣，因此这种空间形式和作家内心象征性地关联了起来。诗歌《走信》中运用了大量的方位名词，却都是虚指而非实际位置：“东方呢-妹妹/西方呢-我/北方呢遇面/实不错/生活苦难/都知道/心呢有你/不得到。”[依玛佐夫 2004:33]借用东西方向来象征二人距离之远，“北面遇面”也是男子的想象，其实“不得到”。见不到面的二人只有借助天空和云朵来传递思念：“请你，妹妹/头抬起/眼观蓝天/再睡起/天上云彩/翻蛋蛋/云彩空空儿呢/有相片/亲爱妹妹/你接手/把你的相片儿/我也收/就打这么/快就醒/天天睡起/‘写书信’。”[依玛佐夫 2004:33-34]这一段诗歌都是男子的内心独白，此时天空和云朵成了男子内心的投射，失去了天空白云的外在形式而是和妹妹传递的“书信”，而书信也只是男子的想象，实则天空白云只是男子寄托思念的载体。诗歌《空想》和《走信》有相同的象征结构，“小伙儿”工作间隙仰观天空生发美好遐想：“头枕土块/脚蹬砖/仰板儿朝上/观哩天。”[依玛佐夫 2004:38]此时天空云彩变出各种美好精致，甚至出现一个“清秀城”来邀请他当皇上。遐想过后又回到工作中去：“小伙就像/睡醒哩/活赶（比）空想/要紧哩。”[依玛佐夫 2004:40]天空和云彩是人物内心世界的投影，悠闲的白云和广阔的天空与人物内心追求相呼应。

总的来看，无论是抽象空间内部的权力空间建构，还是抽象空间所投射的人类与世界的两种象征关系，文学地理学的抽象空间书写都体现出其空间

构建的形而上特点。文学地理空间从地理学的-地理批评的-地理诗学的三种途径的建构形式来看，呈现出一个越来越虚化的空间建构过程，这与作家的文化背景和思维方式密切相关，其空间书写的深层原因要求从中亚东干族文学创作的文化渊源层面进行阐发。

四、中亚东干文学空间书写的文化渊源

中亚东干民族是我国西北回族的后裔，又在中亚乌、吉、哈三国定居 140 余年，可见中亚东干族的发展融合了多个国家和民族的文化。杨建军针对华裔少数民族文学提出了“双重还原”的研究方法：“厘清华人客居国主流文化，华人的汉儒文化，华裔某族的少数民族文化等多重文化元素，在华裔少数民族文学中的不同作用。”[杨建军 2015:122]“双重还原”所言“双重”实则指向了三个层次的文化还原：中国汉儒文化、客居国主流文化和本民族文化。所以，中亚东干文学的研究应该指向中华文化、中亚文化和回族穆斯林文化三个层面，本节则从中亚东干文学空间建构的三个维度出发，来考察作家空间书写的文化渊源。

首先，场域地理空间的建构主要受到中亚文化和俄罗斯文化的影响。场域地理空间主要以地理学的方法建构叙事和抒情的文学地理场景，所以场域地理空间往往和中亚东干人的劳作、生活紧密相关。一方面，作家根据日常的生活场景进行地理空间建构，因此作品中的文学场景往往是带有中亚三国特色的生活环境，比如《夏天》《天上的星》《白云》都是当地环境的再现。另一方面，俄罗斯文化作为中亚地区的强势文化，会以标志物和事件的形式在地理空间和东干人记忆中留下痕迹。比如在《阿夫罗拉》中，西拉儿在游览列宁格勒时既通过各种标志物再现了当地场景，又通过建筑的历史痕迹重现了十月革命的事件片段。

其次，景观地理空间的建构主要受到中华文化和穆斯林宗教文化的影响。景观地理空间建构承载着创作主体所赋予的功能的、审美的、情感的意义内涵。一方面，经堂等具体的空间形式是中亚东干人穆斯林宗教文化的具体体现，经堂空间既是中亚东干人文化的缩影，又是其宗教文化继承和发展的场所，随着时代发展又逐渐承担起道德教育的任务。比如《三个军人》中，叙述者直言“教书”“调教娃们”是他的“营干”，可见经堂是一个具备宗教文化功能的空间构建。另一方面，景观地理空间是作家感情抒发的依托，这种感情抒发分为共性的感情抒发和个性的感情抒发。共性的感情体现为人类共同的感性经验，比如《伏龙芝城》中对时光流逝的感慨，《淡青二门儿》中男女情感的表白等；个性感情则体现为中亚东干人“三重望乡”的思乡之情，

这种思乡之情又集中体现在远离中国故土的思乡之情，以及对心灵归宿圣地麦加的眷恋之情，这集中体现了中亚东干文学里中华文化和穆斯林文化对景观建构的影响。

最后，抽象空间的建构主要受到中华文化的影响。抽象空间是由作家文化背景和思维方式影响而建构的具有形而上色彩的空间形态，其内部体现为一种权力关系，其空间整体的建构又呈现出一种人与世界的象征关系。第一，抽象空间权力关系的言说建基于中华文化中伦理道德传统和民俗生活。中国汉儒文化自古讲究“礼”法，“礼”所体现的就是社会伦理等级制度，人与人之间的伦理等级和权力关系展现在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另一方面，中国传统中方位文化、颜色文化等都蕴含着伦理等级和权力关系，比如传统格局的家庭房屋中，坐北朝南者为正房，四方大地以中为尊，古代官服按颜色区分官职，黄色象征帝王之家等等。中亚地区没有炕，炕是中亚东干人保留中华生活传统的体现。炕空间在中亚东干族生活空间中体现为伦理地位的核心，所以《乡庄》中老者坐在炕上宣布重大消息，《老马富》中老马富因受人尊重而被请上炕。第二，抽象空间呈现出的人类与世界的象征关系建基于中华文化的两个层面：语言文化和中国文学传统。先说语言文化。东干语属于中国西北方言的地域变体，所以中亚东干人在语言表达上和我国西北方言大体上是相通的。中亚东干文学大多以口语形式的中国西北方言书写，所以其思考和看待世界的方式决定了其空间书写必然体现中华文化色彩。再说中国文学传统。几千年的文学沉淀形成了中国文学中独特的意象结构，比如“水”与“爱情”的比类关联在《诗经》中就有体现，《蒹葭》中“所谓伊人，在水一方”更是家喻户晓的诗句。《后晌》中诗人通过先言水景引出相似男女心思的手法就有“起兴”修辞的味道，诗的末尾以“水”结尾更升华了“水”空间的象征作用。可见中亚东干文学中的抽象空间建构与中华文化紧密相关。

结论

中亚东干文学是华裔少数民族文学的重要分支，其文学作品呈现出的大量的空间样貌，本文按照文学地理学的方法将其分为场域地理空间、景观地理空间和抽象空间三个空间维度，三种形态的空间是一个地理中心化-主体中心化-形而上空间的越来越虚化的建构过程。中亚东干文学中的场域地理空间涵盖了中亚东干人生活劳作的自然地理空间及历史沉淀的人文地理场域；景观地理空间则承载着中亚东干民族所赋予地理空间功能的、审美的内涵，以及以“三重望乡”心态为主的私人/公共情感；抽象空间则剥去了地理空间的物质外衣，一方面体现着非均质化空间内部的空间权力关系，另一方面回响着

人与世界/世界与人的双重共鸣。同时，中干东亚文学中的空间书写根植于中华文化、中亚主流文化和穆斯林文化融合的文化土壤，展现出多元的文化内涵。本文从对中亚东干文学的研究中，探索出一条从文学地理学到空间哲学的研究路径，以期为我国华裔少数民族文学研究提供一些经验思路。

参考文献

- [1] [美]段义孚著,王志标译.空间与地方:经验的视角[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7.
- [2] [法]亨利·列斐伏尔著,刘怀玉等译.空间的生产[M].北京:商务印书馆,2021:法文第三版前言 22.
- [3] [法]米歇尔·福柯 [美]保罗·累比诺著,陈志梧译.空间、知识、权力——福柯访谈录.载于包亚明主编《后现代性与地理学的政治》[M].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1.
- [4] [法]米歇尔·柯罗著,袁莉译.文学地理学[M].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2021.
- [5] [吉尔吉斯斯坦]M.X.依玛佐夫著,林涛译.中亚回族诗歌小说选择[M].香港教育出版社,2004.
- [6] [吉尔吉斯斯坦]M.X.依玛佐夫编著,丁宏编译.亚瑟儿·十娃子生活与创作[M].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2001.
- [7] 杨建军.丝绸之路上的华裔文学奇葩[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5.
- [8] 杨建军.世界华裔文学中的伊斯兰文化带[J].兰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3).